

# 多元經濟與《地方創生×SDGs 的實踐指南》的對話

周睦怡\*

《地方創生×SDGs 的實踐指南：孕育人與經濟的生態圈，創造永續經營的地方設計法》，寬裕介著、陳令嫻譯，2022。新北：裏路文化。448 頁。

（寬裕介，2019，《持続可能な地域のつくり方：未来を育む「人と経済の生態系」のデザイン》。東京：英治出版。）

近年由於 COVID-19 疫情和烏俄戰爭大幅衝擊全球經濟、社會和能源等方面，從而也強力挑戰各地人們在生計、生活乃至環境生態等層面的應對能力。當此危急之際，更凸顯地方社會的韌性以及社群的團結和能動性乃是對抗全球逆境時不可或缺的要素，本文即從這樣的脈絡來思考地方社會所需具備的能耐。

寬裕介的《地方創生×SDGs 的實踐指南：孕育人與經濟的生態圈，創造永續經營的地方設計法》（後文簡稱為《地方創生×SDGs》），無疑是這個不安年代的及時譯作。本書作者曾以四種身分參與地方營造：「提供援助的外聘顧問、設計師；隸屬地方政府的創意總監；當老闆成立事務所，雇用人才，執行地方

---

\* 國立海洋大學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E-mail: mychou1209@mail.ntou.edu.tw

營造相關業務；和家人一起生活的當地居民」（寬裕介，2022：440）。他從多元的身分和視角切入，深刻觀察人與經濟的關係。面對日本地方陷入的各種危機，他認為當務之急是重建人與經濟的生態系循環，指出豐富的地方生態系應包含「土壤／地方社群」、「太陽／未來願景」、「風／挑戰」，以及「水／新世代教育」四種環境，並從他豐富的實作經驗歸結出六種重要的實踐能力，包括：描繪（思考）地圖的技術、建立對話場域、聆聽當事人的心聲、呈現未來願景、制定議題和發揮創意。這些技術彼此緊密相關而非各自獨立。書中更透過大量案例與圖解，藉此剖析實戰經驗和如何交互使用這些技術，以達到不同目的。

為清楚說明該怎麼理解、應用 SDGs，寬裕介分層逐項一一介紹各項指標用意與日本相關現況，但這不只是一本拓展人們理解「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以下簡稱 SDGs）和地方創生的書籍，也引導讀者思考各項指標間的關聯性，更詳細描繪了 SDGs 落地實踐時該如何掌握既有脈絡又能因地制宜的操作方法。這樣的示範，也讓讀者有機會重新檢視和思考我們的生活與地方社會、與全球面臨的挑戰之間的關係為何？在這個充滿不安和變動的年代，我們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為此，我們該如何付諸實踐？

為了回應這個大哉問，書中展示了如何以 SDGs 各項指標作為開啟各方對話的基礎，以及如何進一步串起各種地方社群、事業體和公部門間的溝通和協作。寬裕介特別提醒，2015 年聯合國 SDGs 宣言中提到「不棄任何人於不顧」（寬裕介，2022：30），因此要讓每個人——甚至是年輕人與學童——都能參與推動包括地方創生等的公共政策；而要讓每個人有意義地參與，就需要從「涵納」（inclusion）出發，去思考如何設計和建置參與

機制，才能讓特殊和少數群體一起加入，讓這些共同生活在地方的人都有機會貢獻他們的想法和力量。

綜觀全書，《地方創生×SDGs》與筆者關心的社會經濟、共同體經濟（community economy）有許多值得對話之處，以下筆者將之與 Hickel 所著的《少即是多：棄成長如何拯救世界》（後文簡稱《少即是多》），以及 Gibson-Graham、Cameron 和 Healy 合著的《經濟，不是市場說了算》（原書名 *Take Back the Economy*，後文簡稱《經濟》）並置，指出這三本書的共同關懷皆是面對資本主義對於社會團結以及環境生態的危害，並進一步提出有別於資本主義式邏輯的經濟實踐方式。

《少即是多》從宏觀的視角批判資本主義內在的運作邏輯：人與自然兩元論的世界觀和經濟要不斷成長的原則，直言：「資本主義的本質是殖民」（Hickel, 2022: 45, 53, 67）。Hickel 並沒有停留在批判層次，他主張從「泛靈論」觀看世界，以期「萬物緊密相連，並據此行動」（Hickel, 2022: 274-275），並提出「棄成長」——也就是有計畫地減少能源和資源的過度使用，以安全、公正和公平的方式，把經濟帶回到與生命世界平衡的狀態（Hickel, 2022: 42）。由此為基礎建立一個能夠直接增進人民福祉的經濟模式。《經濟》則從制度的視角構築一套以倫理為核心的「共同體經濟」理論和行動指南，來重構（reframe）後資本主義時代的政治經濟架構。《地方創生×SDGs》選擇由微觀的視角出發，宣導量身打造地方經濟永續發展的生態系和行動策略，並運用 SDGs 指標檢視地方面臨的挑戰，找到形成惡性循環的關鍵，再對此嘗試提出改善方式。

這三本書從不同的視角和尺度切入，但同樣提倡能更直接提升公眾福祉的經濟實踐。筆者認為三本書的論點，不僅彼此呼應，

也能起到相互補充之效，讓讀者們能有更完整的視野思考經濟與生活、與環境生態之間的關係。關於具韌性的地方社會所需具備的能耐，從三本書的觀點可以歸納出兩大重點：一、多元的經濟活動、複業的跨界需求，能提升人們面對衝擊的經濟韌性。二、跳脫「追求經濟成長等於追求幸福」的固有思考，即能夠發現幸福所需具備的多元面向。而這是良好的地方社會能提供人們探索跟深思的。進一步的分析如下：

## 鑲嵌於地方社會的多元經濟

《地方創生×SDGs》的主軸圍繞在如何重建「人與經濟的豐富生態系」。為此，作者力倡根據科學方法建立的方法論，而非推廣某些成功案例的模式和步驟（寬裕介，2022：439-440），他希望讓大家知道如何讓每個人都能是行動的主體，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這個觀點如同研究社會創新的學者 Howaldt 等人（2015: 44）所強調公民參與在社會創新過程中的重要性，他們認為看待社會創新的觀點要從「經驗轉移」的邏輯轉變成「變革」的邏輯，因此關鍵「不在於如何將解方介紹和轉移給大眾，而是如何轉化現有的解方成為更好的安排」。公民參與不只是被動的跟隨者和模仿者，而是能夠透過對話討論轉化現有解方成為更好的安排並付諸行動的共同體。這也與《經濟》一書所提倡的共同體（社區、社群）經濟有許多相呼應之處（Gibson-Graham et al., 2021: 38）。首先，對於經濟有著多元的想像和實踐。在《地方創生×SDGs》中提到，日本地方有五種「富足」，其中之一為「不仰賴貨幣經濟的富足」，是根基在有別於貨幣經濟中金錢與商品

等價交易的邏輯。由於作物或農產品無法久存，因此日本鄉村社會裡常會分送親友鄰人，而彼此也禮尚往來，造就非金錢、不等價且多元多樣的交換模式，之所以交換不等價是由於持續處在想回報的人情下，讓交換是基於情感連結而非價格考量（寬裕介，2022：407-419）。這樣的交換不只是物品或勞動的交換，更是情感的交流，從而有助於社群間的互助、共享和團結。

社群是多元經濟重要的基礎，在《經濟》一書中主張，以倫理考量為核心的經濟即「共同體經濟」，指的是「一個決策空間，在那裡我們認可並協商我們與其他人類、其他物種和我們環境間的相互依賴。在認可和協商的過程中，我們成為一個共同體」（Gibson-Graham et al., 2021: 38）。社群也在這樣的互動協商過程中形成同理和連帶。《經濟》重構經濟的樣貌，將之比擬為冰山，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是看得見的冰山之一角，如表 1 上層的經濟活動。然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許多不仰賴貨幣的交易，卻一樣達到了物或服務的交換，這些不列為產值的交換活動，亦是經濟的一部分，如最下層的經濟活動常常受到忽略但其實在生活中亦扮演重要角色；至於中層的經濟活動，其運作類似主流經濟，但加上了「另類」的元素，如：社會企業、以物或服務作為勞工的報酬、販售友善耕作蔬果的商店等（Gibson-Graham et al., 2021: 55-57）。因此，經濟的樣態是多元的，目的也是多元的。

表 1 多元經濟

經濟面向	勞工	企業	交易	財產	金融
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活動	薪資	資本主義式	市場	私有	主流市場
另類的經濟活動	另類支薪 如：自僱者	另類的資本主義式 如：不使用除草劑和殺蟲劑的有機棉公司	另類市場 如：慈善團體經營的慈善二手商店	另類的私有 如：家庭裡兄弟姐妹共享衣服	另類市場 如：微型金融借貸
非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活動	無薪 如：家長提家人縫製衣服	非資本主義式 如：勞動合作社	非市場 如：捐贈衣物給友人小孩或慈善機構	開放取用 如：開源軟體	非市場 如：家庭成員提供家人借貸開創事業

（參考並修改自 Gibson-Graham et al., 2021: 56-57）

經濟的多樣性也創造經濟的韌性，如《地方創生×SDGs》談到地方上有著能夠自行創造工作的富足生活。作者認為地方保留了「百姓型經濟」——人們不只能身兼多職，還能以此進行各種不等價交換。作者更以「複業」而非「副業」來形容這樣鑲嵌於地方生活和需求的工作型態。而身兼數職的另一個重要性在於不同專業間的跨域結合，成了工作者開創新工作和滿足新需求的創意來源（寬裕介，2022：428-432）。這種多元的經濟型態和樣貌不但貼近且深耕地方，又不失創新和開源的動力，同時也能降低現代社會中因為只擅長一項工作帶來的高風險。

## GDP 成長是資本主義福利的指標，不是人類福祉的指標<sup>1</sup>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無論《地方創生×SDGs》或《經濟》提出的經濟想像和實踐，都是關心如何才能使人們感到富足、幸福或快樂。在資本主義邏輯裡的不斷增長和獲利最大化，並無法帶給人們幸福快樂（Gibson-Graham et al., 2021: 59-64）。寬裕介認為真正的「富足」在地方，日本的地方存有五種「富足」，包括：不仰賴貨幣經濟的富足、以正確速度生活所帶來的心靈富足、自己創造工作的富足生活、身為「百姓」的富足生活、徹底活用身體與技術所帶來的滿足（寬裕介，2022：401-441）。《經濟》則主張幸福至少有五種面向：物質的、職業的、社會的、社區的和身體的幸福，如果人們要能真正感到幸福，必須綜合實現這五種面向的幸福（Gibson-Graham et al., 2021: 63）。

在《少即是多》一書中，點破經濟持續增長是改善人類生活和進步動力的迷思，重點不是成長，而是所得如何分配以及投資在公共服務的程度，如教育、衛生和醫療，這些才是促進民眾福祉的關鍵（Hickel, 2022: 183-192）。而收入的提高也不一定讓人感到幸福，重要的是：所得如何分配、福利制度的健全、意義感、社區社群感等（Hickel, 2022: 192-197）。這些都說明了地方的創生和永續，其經濟型態與多元經濟有許多共通之處，目的都是直接與人們的幸福感相關聯。若考量地方的脈絡性和人員組成的異質性，直接複製成功模式的方法將不再適用於尋求真正富足和幸福的地方社會，而必須改由建立和長期經營在地社群，讓每位民

---

1 引自 Hickel (2022: 113)。這句話精準點出成長主義的迷思，以及經濟增長並不等於進步也不等於福祉的提升。相關的討論請參考《少即是多》第二章和第四章。

眾都有管道和能力參與其中。如果經濟生活是一個由人們共同生產、共同協作和共同決策的場域，經濟民主化就是當人們投入地方創生，意圖建構具韌性的地方經濟和社群養成時所需考量的原則，如以自助互助的合作社來滿足地方的各類需求，也要透過社間合作才能逐漸形成合作經濟的生態系，讓地方資源創造的各種財富能夠回流地方。

如果追求象徵經濟成長的國民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簡稱 GDP）無法反映民眾福祉，與其測量 GDP 不如直接測量幸福。Hickel（2022: 214）在書中舉出 2008 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和歐盟發起「超越 GDP」（Beyond GDP）運動，Hickel 他特別提到，為此，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 和 Amartya Sen 發表一篇題為〈誤測我們的生活：為什麼 GDP 不合理〉的報告，表示過度依賴 GDP 使我們看不見社會和生態的健康狀況。後來 OECD 推出「美好生活指數」（Better Life Index），這個指數包含居住、工作、教育、健康和快樂之間的福利指標；其他類似指標還有包括：永續經濟福祉指數（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ISEW）、真實進步指標（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等（Hickel, 2022: 214-215）。如果幸福是人們生活的目的，那就直接測量幸福，並持續探索促進幸福的要素。

換句話說，如果 GDP 增長不直接導致人民福祉的提升，那相對有潛力發展多元經濟的地方社會來說，「累積幸福」會不會其實比「累積財富」更能夠吸引那些追求美好生活的社群呢？



## 臺灣地方創生結合 SDGs 行動的新視角：大學社區伙伴研究

2019 年是臺灣地方創生元年，雖然是受到日本地方創生政策的啟發，但區域發展不均和地方發展的挑戰一直是國家治理的重要課題。這三本書儘管從不同的尺度切入，皆異口同聲地呼籲大家投身於關懷他人、友愛社群、友善環境的社會與團結經濟。近期許多大學亦投入在地方創生與社會實踐的工作中，而在這三本書中都沒有談到大學的角色，因此很值得從臺灣的大學社會實踐的視角提出幾點觀察，也與大家一起思考和對話未來可以發展的議題。

首先，大學的跨領域專業有助於在地方推展 SDGs。大學擁有跨領域的專業，能與地方社會形成伙伴關係，就議題背後的複雜結構成因進行深入探討，SDGs 的具體指標即能當作參考，在《地方創生×SDGs》書中就以 SDGs 作為盤點地方議題和促進跨界對話的重要媒介。再者，大學的特質有助於意識到指標後的問題源頭或關聯性。書中也不斷強調指標間並非各自獨立，而有可能相互影響，進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這提醒大家在看指標時，要更有意識地去關注其間的關聯性，以及會相互增強的因子；這也有助於我們去尋找和辨識問題的源頭，以及現象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聯性。更甚者，大學能夠進一步深究 SDGs 未能涵括的範疇。SDGs 指標列出的議題的確值得關注與實踐，沒有列入其中或沒有辦法測量的問題難道就不重要嗎？在大學社區伙伴研究的過程中，更有機會在實際的場域裡去深究沒有被列入 SDGs 的問題及其成因，並透過眾人的智慧找出可以回應的解方。SDGs 應被視為各方對話的起點，而不該只被看成要達成的目標。臺灣豐

沛的研究能量、豐富的地方知識，以及各族群寶貴的文化和傳統智慧，都能為國際永續發展的理論和實踐提出積極貢獻。

另一方面，對於地方創生、社會與團結經濟來說，經濟只是手段之一，幸福的生活才是目的。故在社群的運作方式上，民主平等、尊重和認可差異，才能讓不同背景、懷抱著不同夢想、享有不同幸福定義的人一起協作。正因如此，三書從各自角度深入，卻一致在治理的層面上強調民主和參與的重要性，這不僅僅意味著人們有參與的權利，更需要讓其都能有意義地與其中。由此可見，問題不是參與的人數，而是哪些群體始終無法被觸及，要如何設計涵納的機制才能讓他們參與進來？提出的想法要如何轉換成可操作的方案？這些都是在實踐層面上需要設計和練習的部分，前文述及《地方創生×SDGs》介紹的六項技術應用在上述情境，以及對於搭起跨域和跨界的協作都非常有幫助。對於臺灣的實踐者和學術社群來說，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思考要如何將臺灣多元的族群和文化結合在涵納治理的實踐中。

最後，無論是地方創生或大學社會實踐，參與協作的各方（如公部門、大學、企業、地方代表、居民等）在場域中隱隱存在著權力不平等的關係，非常需要留心如何在這些權力不對等的相關利益方中，促成較為平等的對話和互動，也必須思考和建立各界的社會責任和社會實踐工作的「場域倫理」，以減少不必要的誤會、傲慢和失禮的打擾。如果地方創生和大學社會實踐的核心是人和社群，那就需要讓參與其中的人們感受到尊嚴和意義。另一方面，評估地方創生和社會實踐型計畫，不該只思考效益或效率，更該反思其倫理面，再透過具體的行動調整，以形成有機和良性的循環。對倫理的敏感度和深度思考也正是人文社會科學擅長之處，這些抽象的思考能讓實踐時所面對到的困境有機會橋接和對

話，不僅為大學的社會實踐工作注入人文反思和社會批判的元素，也因為實踐工作和所有參與者的努力，讓臺灣能更趨近一個正義而永續的社會。

## 參考書目

Gibson-Graham, J. K., Jenny Carmeron, and Stephen Healy 著、周睦怡譯，2021，《經濟，不是市場說了算：邁向幸福經濟共同體的倫理行動指南》。臺北：游擊文化。

Hickel, Jason 著、朱道凱譯，2022，《少即是多：棄成長如何拯救世界》。臺北：三采文化。

Howaldt, Jürgen, Ralf Kopp, and Michael Schwarz. 2015. "Social Innovations as Drivers of Social Change: Exploring Tarde's Contribution to Social Innovation Theory Building." pp. 29-51 in *New Frontiers in Social Innovation*, edited by Alex Nicholls et 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